

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

镇江博物馆 肖梦龙

江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是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通过现今所掌握的资料整理,着重对江南吴国青铜器的分期与各期特征,作一些探讨。

一、吴地青铜器的发现及分布规律

吴国青铜器以往被著录并识别的仅有少数几件带铭铜兵器剑、戈,现在所见几乎全为近年陆续出土,这其中有许多是经过发掘清理伴同陶、瓷器等遗物出土的铜器群,在对其分期订正对吴国青铜器发展序列分期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现将已发表的资料择要分述如下:

(一) 遗址方面

1.自五十年代以来,在发掘或试掘过的一些湖熟文化遗址文化层中,如南京北阴阳营(三层)、谈土村、安怀村、簏子山和江宁点将台、句容城头山、丹徒断山墩、镇江马迹山等,发现铜刀、铜斧、铜镞、铜锥、铜鱼钩以及铜鼎耳、足等^①。

2.1957年在武进奄城内城河的泥炭层下挖掘出一条独木船,同20余件几何印纹陶坛、原始瓷豆等伴出一批青铜器,包括尊3、牺1、三足匝1、三轮盘1、句铎7,计13件^②。

3.1956—1972年先后对扬州邗城和邗沟遗址进行调查清理,发现青铜兵器剑、矛、镞、箭鏃、镞等10多件^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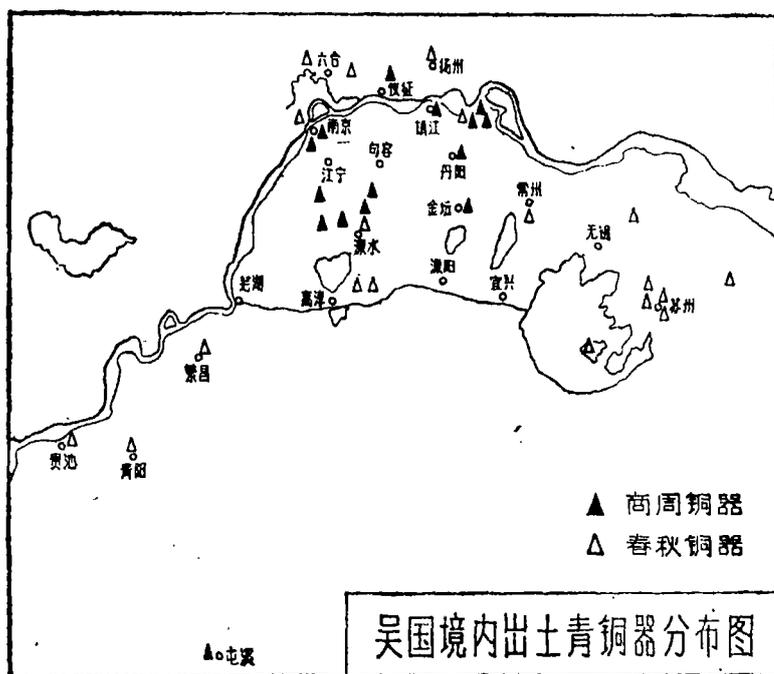
4.1975年在苏州葑门河道疏浚工程中,出土一批青铜器,有尊、剑、锯镰、铜铎、锤、锄、铍、削及箭鏃等,共20余件^④。

5.1975年吴县洞庭西山消夏湾和横泾新联大队发现一批青铜兵器,有剑、戈、矛、镞计11件^⑤。

6.1973年在昆山盛庄发现一处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熔铸遗址,出土有完整的铜兵器3、矛4、戈1及箭鏃,铜工具有锯、凿、铍、铲、镰,还有青铜容器等多件,同时发现青铜块80余重24.2公斤^⑥。

(二) 墓葬方面

分二种情况:一是以随葬青铜器群为主兼有其它遗物的大型墓;一是成组青铜器与陶



图一

器伴出的中、小型墓。

大型铜器群墓迄今发掘或经调查清理的共5处,包括:

1. 1954年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出土青铜器计有鼎5、鬲1、簋1、盂1、盃2、觥2、盘2及角状器2,共16件,另外还有一批车马器^①。现已明了该墓形制为江南流行的土墩墓,属西周康王时期。

2. 仪征破山口西周铜器群。早在解放前1930年就被群众挖出一批青铜器,有鼎、鬲、甗、尊、盘和工具铲、斧等20余件;1958年又征集到该处出土的一件残碎“子作父宝”鼎;直到1959年对出土铜器地点探掘时,搞清上述铜器群为一墓葬的随葬品,同时又清理出土一批铜兵器和工具戈、矛、钺、斧、镰等。此墓前后共出土铜器计40余件^②。

3. 1959年安徽屯溪两座西周大墓,出土青铜器有鼎4、簋2、盂2、尊3、卣2、盘2和三星器1、五柱器2、鸟饰2,共20余件^③。

4. 1982年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出土的有青铜器鼎2、鬲1、簋2、尊2、卣1、壶1,兵器铜矛8、箭簇百余、铜叉及镞,另外还有车马器^④。

中、小型铜器墓发现近20座,主要是:

1. 1960年江宁陶吴西周墓,出土有青铜器鼎、鬲、卣、匜、戈、矛、斧、鹤嘴锄等,共13件^⑤。

2. 1964至1973年间相继发掘清理的六合程桥一、二号及和仁东周墓,三座墓出土青铜器包括食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总计127件^⑥。

3. 1971年高淳顾陇下大路,出土一组西周铜器鼎2、尊1、剑1、箭簇7,共11件^⑦。

4. 1975年溧水乌山一、二号西周墓,一号墓因残仅发现铜鼎1件,二号墓出土方鼎、卣、盘、戈4件铜器^⑧。

5. 1975年句容浮山二号墩M8发现铜戈1件,该墓时代为西周中期^⑨。

6. 1977年南京浦口长山子出土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计有鼎1、鬲3、矛1、戈2、剑1及箭镞等共30余件^⑥。

7. 1979年丹徒谏壁粮山东周墓,出土青铜器鼎3、甗1、罍1、匕1,计6件^⑦。

8. 1979年安徽繁昌一座西周晚期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包括方鼎2、圆鼎4、簋1、甗1、盃1、盘1、甬钟1、鸟饰件2,共计13件^⑧。

9. 1980年吴县何山东周墓,出土青铜器有鼎5、盃1、簋2、缶1、匜1、盘1、戈3、矛3,另外还有箭镞及车马等,总计33件^⑨。

10. 1981年溧水宽广墩出土西周晚期铜器鼎1、簋1、卣1、盃1、盘1、匜2,共7件^⑩。

11. 1982年丹徒大港磨盘墩西周墓,出土青铜器尊1、匜1和车马器一批^⑪。

另外,在吴国土墩墓中还有成陶坛随葬青铜器冶炼块的特殊葬俗,如金坛鳌墩出土230余块重70公斤,金坛城东130公斤,句容茅山西麓10块重7.5公斤,以及丹阳埤城等地均有发现^⑫。

(三) 窖藏见有六处

1. 1964年高淳漆桥里溪春秋铜兵器窖藏,主要是戈和矛,共30余件^⑬。

2. 1976年丹阳司徒春秋中期铜器窖藏,计有鼎11、簋7、尊4、盘3、甗1,共26件^⑭。

3. 1977年安徽贵池东周青铜器窖藏,其中生产工具有斧、铲、耨、铜蚌镰、锯及鱼钩;兵器有戈、矛、剑、刀、镞;生活用器有鼎、盘、杯等,总共40余件^⑮。

4. 1977年苏州城东北东周铜器窖藏,有鼎、杯、剑、矛、锄、镰、斤等,共56件^⑯。

5. 1979年无锡北周巷春秋早期铜器窖藏,簋2、斧1^⑰。

6. 1979年安徽青阳县庙前西周铜器窖藏,有鼎1、甗1、尊2、羊尊1、盘1、编钟4、戈1、矛1,共计12件^⑱。

(四) 零星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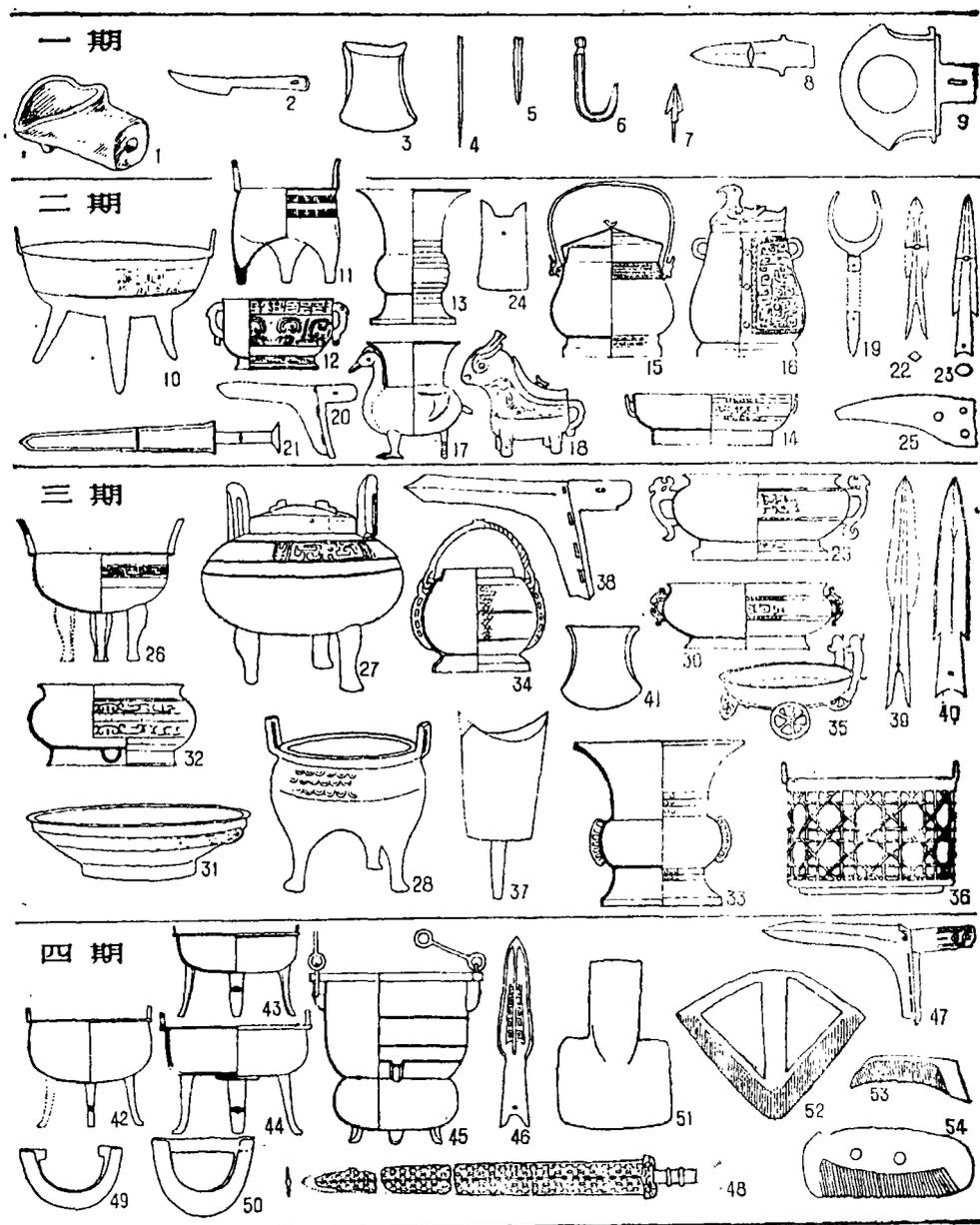
见于集中报道的材料,有王兴平的《南京所出吴国之青铜器》,介绍西周至春秋时期各种青铜容器计24件^⑲。刘兴关于《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介绍西周及春秋铜容器、乐器和兵器等40余件^⑳。陈兆弘同志对苏州地区近年零星出土吴国青铜器亦曾编号列表作过一个统计,共达80余件,主要是春秋时期的铜兵器和农具^㉑。再就是一些单件出土报道材料,如江宁横溪西周大型铜铙^㉒,句容葛村发现的商代铜戈、钺^㉓,以及吴县出土一柄刻有铭文的青铜剑等^㉔。

通过上述几方面出土青铜器资料的汇总排列,时代自商迄于春秋末,各类铜器总数目除有些箭镞、车马器及青铜块不算在内,累计达800余件。考查江南出土吴国青铜器的分布,是有其时代规律的。商周时期的出土铜器地点几乎全集中在宁镇区域,西沿达皖南一带,至春秋时期太湖地区发现铜器点则明显比宁镇地区增多(图一)。这可能说明吴国青铜文化的发源地是宁镇区,西周以后,向东渐移至太湖流域。

二、吴国青铜器的分期与各期地方特征

吴国青铜文化发源于江南的早期青铜文化,即其上限应从先吴时期当地土著民族开创的早期阶段青铜文化为始,下限至春、战之际吴国灭亡后吴文化随之为楚文化所融合为止,目前

以二个典型墓葬为界牌,即武进孟河和苏州虎丘战国早、中期墓^②。这两个墓葬从其形制结构和随葬铜器、陶器群来看,皆已呈现完全的楚式化,吴文化以此为终止。先后可划分四个演变时期。



江南吴国典型青铜器分期图

图二

1. 冶铜工具陶勺 2. 铜刀 3.-41. 铜斧 4. 铜锥 5. 三棱铜锥 6. 铜鱼钩 7. 铜镞 8-20-22-23-38-47. 铜戈 9. 铜铍
 10-26-27-42-43-44. 铜鼎 11-28. 铜鬲 12-29-30-31-32. 铜簋 13-33. 铜尊 14. 铜盘 15-34. 提梁卣 16. 飞鸟盖
 双耳壶 17. 鸳鸯形尊 18. 觥 19. 铜叉 21-46. 铜剑 24. 铜钺 25. 铜镞 35. 三轮铜盘 36. 盘 37. 句孺
 39-40-48. 铜矛 45. 觥 49-50. 铜锄 51. 铜铲 52. 铜舞 53. 铜锯 54. 铜钺

第一期,江南青铜器的萌生时期。绝对年代大体与中原商代相当。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主要见于“湖熟文化”前期遗址,如经发掘的南京北阴阳营、锁金村以及镇江马迹山等。在这些遗址文化层中,普遍发现冶铸青铜器的遗存,常见有铜矿石、铜炼渣、铜锈渣和小件青铜器,在北阴阳营还发现炼铜坩埚与挹灌铜液用的陶勺(图二:1)。这些出土的实物资料,不但标志着江南此时已进入青铜时代,同时说明青铜冶炼在当时当地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手工业。

综观这一时期江南青铜器铸造特点:

1.冶铸青铜器的遗存虽有比较普遍地发现,但非常分散,规模甚小,如北阴阳营出土的炼铜坩埚直径只有17厘米,另还有陶勺,这些青铜冶铸工具与中原商朝不同,标志着江南地区青铜铸造术有自己的技术传统。

2.青铜制品的种类不多,主要是小件工具和兵器,如铜刀、斧、凿、锥、鱼钩及戈、矛、钺、铍等^②,容器类仅发现鼎耳、足。铸制粗糙,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图二:2—9)。

3.器型大都是照样模仿殷商,表明受商文化影响。但亦发现有的器物形制显具地方特点,如句容葛村出土铜钺,钺中作一大圆孔,半圆形刃,与中原商代常见钺体呈长方或正方形相异(图二:9)。

第二期,吴国青铜器的飞跃发展时期。绝对年代相当商末至西周前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荆蛮抵达江南,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勾吴”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更加促进了江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出土的青铜器,非但数量丰富,而且在种类与制作质量上都大大改观。

这一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主要见于吴国奴隶主贵族墓葬中(出典型器群的大型墓有丹徒宜陵墓、母子墩墓、屯溪一号墓及仪征破山口;中小型墓以溧水乌山一、二号墓为代表)。随葬青铜器的组合规律,大型墓包括礼器类有鼎、簋、尊、卣、盘,还有鬲、壶、盂、觥等;兵器类有矛、戈及箭镞;工具类有铲、斧、镰等,另外还有车马器。中小型墓一般是鼎、卣、盘和铜兵器。

这一时期江南吴国青铜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江南地方制造铜器的内在因素占主导地位,使其面貌与中原铜器有明显区别;二是江南吴器开始在器形与纹饰上显示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下面分别阐述:

(一) 江南铸造铜器与中原的区别

在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铜器群中,均发现共存有两种风格的铜器,一种是中原铜器,以宜陵墓矢簋、母子墩墓伯簋、屯溪一号墓“闾父己尊”以及破山口“子作父宝鼎”等为代表。这类器物在其铸造、器型纹饰特征和铭文书体、刻铸部位等方面和中原的常见器皆无区别,可明确断定为中原传入江南的铜器。这类器在江南出土铜器中所占数目极少,只有在大型墓中才偶尔出现一、二件,墓主身分无疑当属吴国最高统治阶层的周人。另一种就是地方土造产品,江南发现的绝大部分铜器均属于此,为江南青铜器的主流。它们之间的区别是:

1.青铜合金成分上的不同。从铜器的外观颜色看,中原铜器深绿,除锈后胎质橙黄。而江南地方铜器色泽偏暗,脱锈后青灰泛白,这实际与它们的青铜合金成分不同有关。现经对母子墩、屯溪及溧水宽广墩等不少出土江南铜器所作光谱性或化学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它们的铅含量都较高,与当地土墩墓中出土青铜块是一致的,属铅青铜^③。而中原此期铜器均为锡青铜。

2.在铸造技术上,江南铜器和中原一样都采取通体合铸法,但其工艺水平较之中原尚逊一筹,明显不如中原铜器精良。常见于中原铸造铜器上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即器底面带铸范的方

格线纹,如母子墩伯簋,这在江南地方铜器上是绝对没有的。江南铜器中的炊器鼎、鬲一类器物,铸成后通体范痕,非经打磨修饰即行使用,表面显得非常粗糙,暗然无光,这是江南铜器铸作上的一个明显的地方性特征。

3.中原铜器造型庄重,在主题花纹周围常填以云雷纹衬地,而主题花纹上往往再刻花纹,形成三个层次的花纹,工整繁缛。而江南铜器则全然别具一格,器体单薄,花纹装饰粗犷简练,不施地纹。

4.常见中原铜礼器上铸有铭文,而这一时期江南铸造铜器皆无铭文。西周江南奴隶主贵族所铸造的一些青铜器仅是实用而已,如出土鼎、鬲器底均满积烟炱,簋、尊等许多器物也常带修补斑痕,足见其使用期是较长的。

(二) 江南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特色

1. 造型上特有的地方形式

这一时期江南铸造青铜器的形制特点,总的说来在基本保持与中原同类器形相一致的前提下,而富有多方面的地方变化形式,有的表现为器体某部位上的差异,有的则全然为江南所特有的器形。我们称前者为“变异型”,后者为“独创型”。

变异型铜器比较多见,试举几例说明之。如宜侯墓、母子墩墓以及破山口的高裆袋足鬲,其造型类似当地“湖熟文化”中的陶鬲,而与中原鬲的形制迥然有别(图二:11)。母子墩双兽首耳簋,唇沿细卷,口至腹成直筒形,也和同时期中原簋的侈口、翻沿、鼓腹形制相殊异(图二:12)。再从目前江南出土的一些提梁卣来看,亦饶有地方色彩,除盖的造型别于中原,如母子墩一件卣盖面斜直,盖提手铸作小鸟形,别有意趣(图二:15)。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提梁端牺首一律为牛头形状,与中原卣提梁首端一般均呈羊头形相比,确是另具一格。

独创型铜器,除众所周知的宜侯墓角状器、屯溪一号墓五柱器外,还有宜侯墓的浅腹、三足外撇的小鼎,以及一对兕觥亦和中原商周铜器中常见的觥不一样(图二:18)。屯溪锥足鼎(图二:10)。镂空耳扁体簋和腹作凸棱形的盂,破山口四风大盘、带盞鬲和溧水乌山二号墓出土的盘等(图二:14),皆不是中原体制。母子墩带鋨铜叉,似为兵器,但头部无锋,形制罕见,用途难定(图二:19)。鸳鸯形尊,造型奇特优美,取材于江南水乡特有的鸳鸯鸟形象,这在中原鸟兽尊类中也是没见有过的,体现了江南青铜艺术工匠们的独特创造(图二:17)。还有该墓一件飞鸟盖双耳壶的器形同样标新立异,自成一格(图二:16)。

这一情况同样表现在青铜兵器和工具类。见于溧水乌山二号墓的铜戈,长胡二穿,援狭长,锋呈角度很小的直线三角形,内端下角有一缺口为目前所见吴国戈制的最早形式(图二:20)。母子墩和破山口出土的铜矛皆狭叶,中脊起棱,銎口端呈长长的两尖叉形。破山口铜斧的銎口,亦作双尖叉式,具有装柄加固的科学实用价值,不见于中原(图二:24)。另外,圆刃釜式钺和铜镰,则明显仿照当地石钺和石镰形制铸作的(图二:25)。目前发现吴国最早的铜剑,出自高淳顾陇下大路一组铜器中,其特点剑身短小、三角形锋、双刃平直、平脊、无格、扁圆茎近首中空、圆盘形首,铸作较简单粗糙(图二:21)。

2. 纹饰上的浓厚地方色彩

从出土的这一时期青铜器纹饰来看,既吸取了中原铜器上的某些花纹图录,又使之发生变化而呈现出地方色彩,同时较多地采用当地陶器上的几何形纹样。根据不同器物的装饰部位,灵活地加以构思布图,从而形成自己纹饰上的崭新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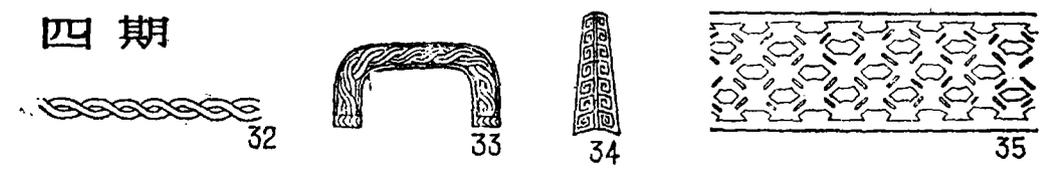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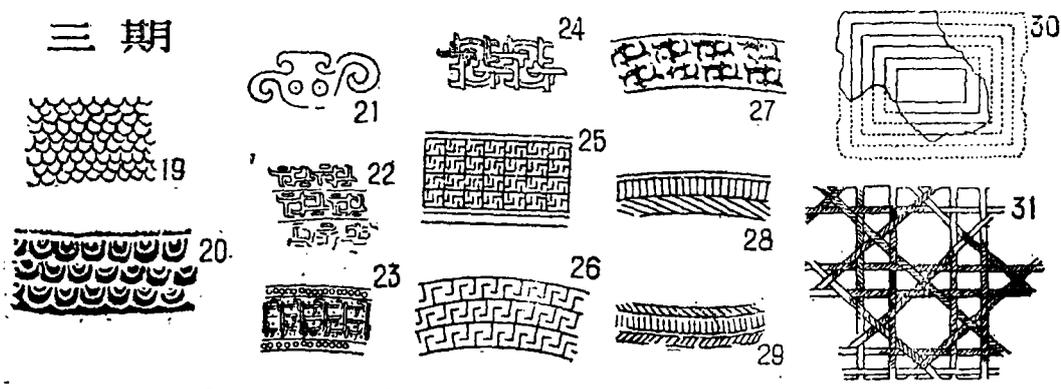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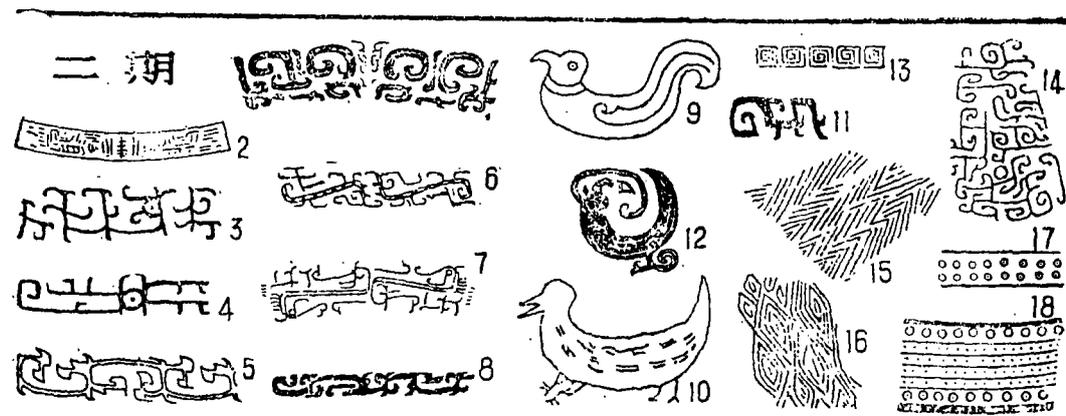
吸收中原铜器上的花纹,这一时期主要是饕餮纹、夔纹、鸟纹等。这类纹饰看上去是从中原同类纹饰脱胎演化而来,但细察之却又觉得与中原显然不同,别有风味。如母子墩双兽首耳簋腹部主体纹饰,即仿中原流行的饕餮纹,但构思变得稀疏简略,不施地纹,已失去它原来的繁褥神秘性(图三:1)。溧水乌山一号墓铜鼎所饰细线条组成的简化变形饕餮纹形象,和中原对照则相差更远(图三:2)。夔纹在江南这一时期铜器上的运用最多,变化亦多,如有作云形夔纹、“C”形夔纹等。这类图案化的变体夔纹,充分利用几何图形的多变性,勾画出丰富多彩的花纹形态,故有人称此类纹饰是具地方特色的几何形勾连纹(图三:3—8)。这些纹饰构图线条粗疏流散,花纹单位较长,作浅浮雕式。鸟纹的运用也比较多,除有作立体装饰(如母子墩卣盖上的鸟提手、壶的飞鸟盖及破山口大铜盘口沿上的立鸟等),造型都非常生动形象,为中原铜器所罕见。再就是用于器腹部的鸟纹饰,都采取单线条刻划的独特手法,简洁明朗地勾画出一只小鸟,如破山口铜盃的阴线鸟纹(图三:9)。而高淳漆桥一件卣上的阴线鸟竟画蛇添足地作四条腿(图三:10)⑥。在母子墩鼎上则又以宽凸线形式,把垂冠长啄鸟的形象布成几何图案化(图2:11)。丹阳司徒尊上的成对大风鸟纹,顶冠不象中原那样皆垂于鸟首之前,而是向后卷曲(图三:12)。所有这些都别出心裁地异于中原同类纹饰。

另外,在仿中原铜器的一些附加装饰上,也具地方特色。如对鼎、鬲、簋、卣一类器物口沿下附加浮雕兽首的形式,花样百出。所见母子墩双兽首耳簋,口沿下中间所附饰浮雕牺首作蝴蝶形,鼎为“串”形,鬲为“J”形;溧水乌山一号墓鼎为“崧”形,屯溪鼎作“人”形,溧水卣凸出一“蛙”形等等。由此可见江南青铜器的花纹装饰是不受什么体例限制的,不象中原那样规范化。有时显得较随意草率,如江宁陶吴红旗水库出的一件弦纹鼎,一耳有饰,一耳无饰,表现出装饰上的极不严格性。江南铜器的另一类纹饰就是采用当地陶器上的几何图形纹样,常见有云雷纹、折线纹、套菱纹、圆圈纹、圈点纹及细绳纹等。典型饰件如宜侯墓角状器、车马器、屯溪一号墓簋、盘,母子墩鼎、鬲、卣和江宁横溪铜铙等(图三:13—18)。它们有的为原几何印纹陶纹饰的直接采用,有的经过提炼,重新组图,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原几何陶纹的固有单位元素是很清楚的。

这一时期,江南吴国青铜器在纹饰的布局艺术上,也开始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母子墩鬲腹作两周条带方雷纹的装饰方式,就不见于中原铜器。另一件飞鸟盖双耳壶的花纹布局,更有它独到之处。通常所见中原壶一类高体器物的纹饰,一般皆采取由上而下的分层布图法,但此壶则不然,而是以附加方钉纹的凸素条纹作间界,大刀阔斧地将壶体周身竖向劈作四片大面积的纹区。每纹区内运用粗犷豪放的刀法满刻大朵的云形勾连纹图案,而各纹面的云形纹形态又横竖不一,互不对称,潇洒自如,流而不乱,疏而不散,主题突出明快,在特殊造型的飞鸟形盖的映衬之下,显得很有气势。再如溧水卣盥梁端除作两牛头首外,而在提梁上部两侧又分别附加两个四角牺首,这样使卣体增添了层次感,显得更加挺立俊拔,如此装饰艺术形式,也是极见匠心,为其它地方所没有的。

总之,江南这一时期的青铜铸造业随着吴国的建立,比之先吴时代出现较大幅度的跃进,中原周人的南下和由他们带来的一部分中原铸造铜器,为江南青铜器铸作树立了楷模,对江南青铜器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具有先吴青铜冶铸传统经验的江南艺术工匠们,在仿造西周各种青铜器物时,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其原样,而是富有创新精神,并紧密结合和体现本地民族文化特点的艺术风格。江南吴器特色,从这一时期业已开始形成。

第三期,吴国青铜器铸造完全进入具有地方风格的成熟时期。绝对年代相当西周后期至



江南吴国各期青铜器的文饰

图三

1. 简化饕餮纹 2. 变形饕餮纹 3—7. 各种变体夔纹 8. 几何形勾连纹 9. 阴线鸟纹 10. 阳线四脚鸟纹 11. 几何图案化鸟纹 12. 大风鸟纹 13. 云雷纹 14. 云形勾连纹 15. 折线纹 16. 套菱纹 17—18. 陶纹 19. 垂鳞纹 20. 垂鳞纹 21. 阴线刻鼻面形纹 22—24. 几何形勾连纹 25—26. 单线构成的几何形纹 27. 纠结草叶形纹 28—29. 梯格纹 30. 套长方格纹 31. 米筛纹 32. 绳纹 33. 陶纹 34. 云雷纹 35. 几何形纹。

春秋早期。属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铜器群，主要有江宁陶吴、南京浦口长山子、丹徒磨盘墩、溧水宽广墩及安徽繁昌和屯溪二号墓等。随葬的铜礼器一般组合为：鼎、鬲、簋、尊、匜，还有兵器、工具类及车马器。另外，武进奄城一批铜器和丹阳司徒、高淳里溪、无锡北周巷及安徽青阳的铜器窖藏，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在上列器群或其它零星出土中，皆不再见中原铸造的输入铜器，全部为清一色的江南地方产品。

综观此期间吴国青铜器特征，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1. 前期流行的一些粗制器物或器表未经打磨修饰即付使用的毛糙现象绝迹。器体单薄，俏俊。

2. 器形在实用的前提下，追求奇特新颖。这一时期各类器物中都涌现出一批新奇器形，如新流行一种鼎的体制，宽大立耳外撇，盆形浅腹，三兽蹄高足聚收，整个器形给人轻飘不稳之感。器例包括丹阳司徒Ⅱ式鼎、高淳出土Ⅲ式鼎、南京市博物馆藏重环纹鼎、六合新集出土变形云雷纹鼎以及安徽繁昌Ⅲ式鼎等(图二：26)。均为中原鼎类中所不见。还有繁昌Ⅲ式鼎的形式更是特殊，尤如后世之“香炉”形(图二：27)。而青阳双附耳浅盆腹鼎的足，作两端粗中间细，呈半筒状蹄形足，也甚为奇异。江南普遍出土，式样变化多端的扁体簋，更具这一期吴器特色(图二：29-32)。另外，奄城三轮铜盘(图二：35)、三足匜和牺匜，溧水宽广墩米筛纹镂空盘(图二：36)，高淳漆桥绳索纹提梁圆球腹卣(图二：34)⑨，浦口长山子侧附耳蹄形足鬲(图二：28)，丹阳司徒窖藏的突棱腹尊，丹徒磨盘墩，喇叭口下附一单耳高筒尊，安徽青阳双龙耳尊和羊尊等等器形，都是江南仅有而风格独具的。

3. 保持传统，根据实际需求对中原有些器型进行扬弃。在这一时期的江南吴器中仍可看到商代铜器特征的一些遗传，如鼎的圆锥足、尖锥足，一耳与一腿对应，另一耳处两腿中间，这都是典型商鼎特点。尊也是这样，商晚、周初流行的三段式高筒尊，在中原至西周中期即已消亡，为矮体垂腹尊所取代。但在江南它仍继续盛行，垂腹尊则几乎不见。这一时期江南流行三段式高筒尊的形制演变特点是，较前期喇叭口径变小，腹径增大，并由原先的圆鼓形皆改作扁鼓形，有的口沿下还附一单耳或带双龙耳，以及腹部两侧加一排镂空扉棱形的装饰，如高淳顾陇铜尊等(图二：33)，成为具江南特色的独特器形。这一时期江南多次成套出土的(一般大小相递7至8件)新型打击乐器句铎，考察其体制，亦当借鉴商代以槌敲击成组铜铎(三或五个)而创作的，为吴越特有(图二：37)。但在中原地区这一期间所出现的一些新器形如簠、簋之类，江南却不见，而在江南地区的奴隶主贵族墓葬中，青铜器却常与原始瓷器伴随。另外，中原西周中期以后开始新流行的典型的器下具三附足的夔口带盖簋，在江南也从没见过，江南流行的是各式扁体簋。

4. 青铜兵器和工具类。铜兵器铸作精致，锋刃锐利，并开始出现纹饰，是吴国兵器制造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形制特点继承前期而略有变化，如戈见于高淳里溪兵器窖藏和句容浮山Ⅱ号墩，锋呈直线三角形，长胡三穿，援上部有方穿以代上齿，有的内下角缺口，明显是由上期的戈直接演化而来(图二：38)。矛，在高淳里溪窖藏中共出土23件，除1件短宽叶、长圆銜，銜上附一半环鼻式矛为新型制外，其余均为上期双叉銜型矛的发展变化形式(图二：39-40)。铜剑从溧阳竹簏的出土形制来看，剑身增长，但仍同上期一样呈三角形锋，双刃平直、平背，圆盘形首，有所进步的是出现扁桃形格和茎上加双凸箍，特别在剑格上开始刻铸纹饰。另外，见于高淳里溪兵器窖藏中的一件“匕首”形器上，亦铸有雷纹和回纹，反映了吴国此期间铜兵器铸造工艺的新发展。铜工具见无锡北周巷窖藏铜斧，长方形銜，宽弧刃，刃角外移，正背面

微凸,与中原斧型相异(图二:41)。

5.在花纹装饰上,各种几何形图样已跃居铜器纹饰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常见流行的主要是:(1)继续上期的几何勾连纹,但此期变得花回单位短小,构图上整繁密复杂(图三:22—24)。(2)以单线条构成近似回纹形态的几何图案(图2:25—26)。(3)纠结草叶形纹(图三:27)。(4)几何图案地纹上密布芒刺纹。(5)梯格纹,套长方格纹及编织米筛纹等(图三:28—31)。以上这些铜器装饰的几何形纹,皆可在江南陶瓷器上寻见其踪影,反映吴国铜器纹饰与陶瓷器纹饰间的裙衣关系(图三:附陶纹)。

这一时期的铜器纹饰中,还见有直接取源于自然界的动物图象,如淞昌盂盖面的盘蛇纹及盘腹内壁上的联贯鱼纹等,都描绘得十分生动,形象逼真,富有写实意味。而该盂的腹内,外壁和底面上均作纹饰,这种装饰形式也是江南吴国铜器仅见的。仿中原同时期纹饰,如夔龙纹、窃曲纹、重环纹和垂鳞纹等,其风格面貌仍同前期一样,都已经过变化而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以垂鳞纹为例,中原垂鳞较宽,一般作三层装饰。而见于溧水宽广墩盂上的垂鳞纹片细窄,共有七层。特别高淳漆桥圆腹卣,除口颈和圈足外,遍体满布密密麻麻的鳞片纹,犹如鱼鳞一般(图三:19)。再就是表现在对中原纹饰的使用上非常随意,如垂鳞纹和重环纹,在中原一般都比较规整地用于鼎、簋、盘、匜器物上,而在江南则不受任何限制,除上举溧水盂、高淳卣的垂鳞纹外,所见浦口长山子鬲及青阳鼎耳上也用大大小小任意刻划的垂鳞纹和重环纹(图三:20)。长山子鬲口沿上四个“十”字形纹饰以及足部阴线刻的兽面形象的图案(图三:21),亦尤为特殊。还有,将中原纹饰与江南地方纹饰有机地结合运用在同一器体上,如无锡北周巷二号簋腹部所饰细密规整的几何形纹中间,附加中原风格的两组四枚乳钉纹,即是这一装饰手法的代表。

第四期,吴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绝对年代相当春秋中、晚期。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技术水平,以其著称于世的铜兵器为标志,高超中原诸国。

属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出土的吴器群,墓葬包括六合程桥一、二号及和仁东周墓,吴县何山和丹徒谏壁粮山墓等。窖藏有苏州城东北及安徽贵池。另外苏州地区大量零星出土的青铜兵器和农具皆为这一时期遗物。

考察此期吴国青铜器的演化,离不开时代背景。当时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各自称王称霸,战争频繁,由此在客观上给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广阔道路,出现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局面。吴国这时也开始“益疆称王”、“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在这一社会形势的制约下,同其它列国一样,原有的吴文化许多地方传统特点相对减弱,而列国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因素逐渐增强。具体分析这一期间江南出土吴国青铜器所表现出的地方特征,可概括成如下几方面:

1.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器铸造方法,除继续熟练沿用分铸嵌入法外,对有些精致铜器附件开始采取焊接新技术,纹饰上普遍运用印模法。从目前的实物发现来看,吴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经发明了炼铁并能锻铁的先进工艺,如六合程桥出土铁块和锻铁条等。另外,溧阳出土一件甬钟和二件钲,甬内都嵌有铁心,安徽贵池发现的东周青铜坯,有磁性。经作光谱定性分析及化学分析,含铜60.68%和59.35%,其余为铁。此铜坯是铜、铁合金的典型物件,可见吴国在铜、铁混合使用方面曾进行过大胆的试验,开创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铜铁合制器物的先导。由于铁器的使用,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坚硬而锐利的工具,以便对青铜器进行更加精密的加工。所以目前发现吴国铜器上的描绘宴飨、狩猎等贵族生活为主题的线刻图画,刻线细如发丝,如不是使用铁刀一类极锐利锋刃,而想在铸好铜器上刻划出那样精细流畅的纹饰,是不可能的。这种青

铜器的或刻工艺,到战国早、中期才比较流行,这方面吴国处于领先地位。

2. 所见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器形制,明显分为二种类型:一种是本地特点的造型,这类器物以出土较多的竖耳、浅腹、高蹄足外撇鼎最富有代表性。如在六合程桥、和仁墓,吴县何山墓,丹徒粮山墓以及窖藏和零星出土中均普遍发现(图二:42—43)。还有一些地方形式的器物造型,如丹徒粮山铜甗,器形为甗与三足釜的合体,中间束腰部有一水注,与早期当地流行的陶甗形制有着渊源关系(图二:45)。该墓铜甗底带三蹄形短足,与其它地区甗底一般作圈足式相比,亦显得有地方特点。

另一种是吸取其它列国同期流行的器物造型,主要受楚、蔡等邻近国的影响较大。如在上述一些墓葬中,皆可见与楚、蔡风格相似的一些铜器,这其中有些可能是战利品,如吴县何山墓铜盃,就有铭“楚叔之孙途”可证为楚器。

3. 在纹饰上,这一时期的吴国铜器同其他列国趋向一致,主要通行构图繁密的蟠螭纹以及螺旋纹、羽状纹等。吴国传统特色的几何形陶纹仅见于器耳等次要部位上(图三:32—35)。

4. 吴国的青铜兵器,是这一时期青铜铸造工业的突出发展项目,尤其是宝剑称冠于各国,《战国策》、《庄子》等古籍中皆有记载。历年来吴兵器不但在本地区有较多的发现,同时由于当时的交往、馈赠、嫁女、出亡以及战争诸原因,不少吴国铜兵器流传列国,近来就在各地发现了不少吴剑,“吴王夫差剑”出于湖北襄阳蔡坡和河南辉县琉璃阁^④，“吴王光剑”出于山西峙峪^⑤“攻敌太子姑发剑”出于安徽淮南蔡家岗等^⑥。而通过本地区墓葬出土的一些成组兵器来看,此期吴兵器的特点有二:一是兵器类型增多,其基本组合形式为戈、矛、戟、剑、铍。进行远射、格斗和护体三方面功能的武器俱全。二是每一种兵器形式丰富,说明吴国在对兵器铸造形式上,除坚持自己传统体制外,能够广取列国之长。如戈就有短胡一穿、长胡二穿、三穿、四穿之分。其中狭长援,援穿上带鼻饰者,据安徽寿县八万山蔡侯墓所出带铭文的戈分析,明确为吴、越特点(图二:47)^⑦。各式铜矛中,鏃口端呈两圆弧尖形的,显系前两期吴式矛的演化(图二:48)。戟从六合程桥一号墓出土一件带柄完整器,全长2.27米,与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楚国车战戟是一致的^⑧。剑的形制以六合程桥一号墓I式剑为代表,锋呈弧形尖状,刃微外弧,剑身隆脊有棱,格上刻缕镶嵌纹饰,茎作圆柱或扁圆柱形,圆盘形首。精致名贵剑身往往满布花纹,常见有几何形纹及火焰状纹,如山西峙峪出的吴王光剑,河南琉璃阁出的吴王夫差剑以及传世的吴王夫差剑,均属此式剑,是吴国晚期的典型剑制(图二:46)。此期铍的形制分双翼圆鏃式、三棱式及圆锥式三种。

5. 青铜农具普遍发现,此期出土铜农具种类较前剧增,以其使用来分,有用以砍伐开发农田的斧、铍、锯,有掘土刨地耘田用的耒、铲、锄、耨(有称“犁”形器),有专门收割的铜铤(有称“蚌镰”)和锯镰等,凡农业生产上需要的一套工具,可以说已达到应该具备的程度(图一:49—54)。在器形制作上,也颇具地方传统特色。如耨的形制可上溯到江南新石器时代的石制耘田器;镰的发展脉络上下看得更清楚,由当地石器时代石、蚌镰,到见于破山口的吴国早期铜镰,直至此期间的锯镰,其形制演变一线贯通。这种锯镰一面平滑,一面铸成平行篾状纹,到刃部成锯齿形,愈使用磨损而锯齿刃口越加锋利,不需要另行磨砺,用时装短柄尤适于收割成束的水稻,至今江南农村仍在继续用着这样的铁锯镰。这种铜锯镰在其它地区虽亦偶有发现,但江南最多,当是吴国的创造。以手握使用的锯齿口铜铤,为剪取旱田作物穗的专用器具。

6. 在这一时期的吴国青铜器上开始出现刻铸铭文。其书法字体分为两种:一种为列国流行的瘦长“玉柱体”;另一种为鸟书,即鸟篆文,这种文体据目前所见实物资料,始于吴国的王子

戈,在公元前526年以前。至于越、楚、蔡、宋诸国兵器上亦见流行这种文字,当仿自吴器^⑤。还有些长篇铭文如吴王光鉴达50余字^⑥,记载着当时吴国外交活动方面的重要史事。吴器铭文用韵精严,反映出高度的文化水平。

三、小 结

以上根据现有出土资料,将江南吴国青铜器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其中一期的先吴时代,由于目前出土铜器材料还极为贫乏,仅能看到它受商文化影响比较重,其它方面还是模糊不清。而自二期吴国建立后,江南地方铸造的青铜器犹如异军突起,直至三期逐渐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传统。到四期由于受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冲击,吴国青铜器遂趋向比较统一的南方型式。这期间虽然还存在某一小段上的缺环,如周初的铜器迄今不见,但这亦无大妨,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江南吴国青铜器自上而下的发展轮廓,现在看得还是比较清晰的。

江南古来为铜锡的名产地,据《禹贡》记载“厥贡唯金三品(金、银、铜)。”《周礼·考工记》亦曰:“吴、粤之金锡,此材者之美者也。”在江南地区土墩墓屡有出土成坛的青铜块,除在本地视为一种财富象征随葬外,它是否主要为了便于向外输送而特地炼成的呢?很值得研究。而南方青铜冶炼技术的渊源又在哪里?这将是我们在今后考古工作中尤应加以探索的问题。

单就现有资料来看,江南吴国青铜器在其起步时间上,比之中原晚得多。究其原因,应是与本地区当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管理机构,各地的青铜冶炼业还仅是由分散的氏族部落自行操办有关,如在宁镇地区各“湖熟文化”台形遗址,常有零星的青铜冶炼遗存发现。至商末周初吴国建立以后,江南地区的青铜铸造工业才可谓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因为吴国的都城地区为周人所居,故而西周青铜文化对吴地的影响比较强烈,也促使地方青铜文化迅猛发展。但是,江南人民在对外来文化的吸取与借鉴上,也并非“邯郸学步”,而是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矿产资源条件,并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特长,从铜质的熔炼到器物造型及花纹装饰等工艺方面,均体现出生动活泼、富于革新的精神,这是吴国青铜器艺术发展史上的值得赞道的地方。至春秋中、晚期,吴国的青铜冶铸技术已是后来居上,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

注释:

①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1期;

《南京锁金村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3期;

《南京安怀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5期;

镇江博物馆:《镇江市马迹山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11期。

② 倪振述:《沱城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4期。

③ 陈达祚、朱江:《邗城遗址与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文物》1973年12期。

④ 廖志豪、罗宝芸:《谈苏州封门河道内发现的耕战青铜器》,《苏州文物资料选编》1980年9月。

⑤ 南波:《江苏省吴县洞庭西山消夏湾出土一批石器和青铜器》,《文物》1977年1期;

张志新:《吴县发现春秋时期的铜剑》,《文博通讯》1979年23期。

⑥、⑦ 陈兆弘:《崑山盛庄青铜器熔铸遗址考察》,《苏州文物资料选编》1980年9月。

⑧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期。

⑨ 王志敏、韩益之:《介绍江苏仪征过去发现的几件西周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2期;

尹焕章:《仪征县破山口探掘出土铜器记略》,《文物》1960年4期。

- ⑩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4期。
- ⑪ 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5期。
- ⑫ 李蔚然：《南京发现周代铜器》，《考古》1960年6期。
- ⑬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6年3期；
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年2期；
吴山菁：《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考古》1977年5期。
- ⑭、⑮ 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 ⑯ 刘兴、吴大朴：《江苏溧水发现西周墓》，《考古》1976年；
镇江博物馆：《江苏溧水乌山西周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1978年。
- ⑰ 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浮山果园西周墓》，《考古》1977年5期。
- ⑱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浦口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0年8期。
- ⑲ 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出土东周铜器》，《考古》1981年5期。
- ⑳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繁昌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2年12期。
- ㉑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文物》1984年5期。
- ㉒ 南京博物院资料。
- ㉓ 《丹徒磨盘墩遗址发现一座西周墓葬》，《新华日报》1982年11月11日第1版。
- ㉔ 镇江博物馆：《江苏金坛宝墩西周墓》，《考古》1978年3期。
- ㉕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淳出土的春秋铜兵器》，《考古》1966年2期。
- ㉖ 镇江博物馆：《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8期。
- ㉗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8期。
- ㉘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城东发现东周铜器》，《文物》1980年8期。
- ㉙ 冯晋仁：《无锡北周巷青铜器》，《考古》1981年4期。
- ㉚ 石谷风：《青阳出土的西周晚期铜器》，《安徽文博》1983年总第3期。
- ㉛ 王兴平：《南京所出吴国之青铜器》；
江苏省社联：《1981年年会论文选》(考古学分册)1982年2月。
- ㉜ 南波：《介绍一件青铜镜》，《文物》1975年8期。
- ㉝、㉞ 《句容赤山湖及其附近出土的商、周铜器》，镇江博物馆《文物考古资料汇编》1976年。
- ㉟ 张志新：《吴县出土一柄刻有铭文的青铜剑》，《新华日报》1981年8月22日第3版。
- ㊱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武进孟河战国墓》，《考古》1984年2期；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虎丘战国墓清理简报》，《文博通讯》1979年25期。
- ㊲ 肖梦龙：《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文物》1984年5期；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4期；
邹厚本：《宁镇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1983年年会论文(未刊稿)。
- ㊳、㊴ 镇江博物馆馆藏资料。
- ㊵ 襄阳考古训练班：《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76年1期；
崔墨林：《河南辉县发现吴王夫差铜剑》，《文物》1976年11期。
- ㊶ 戴遵德：《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文物》1972年4期。
- ㊷、㊸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4期。
- ㊹ 湖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1期。
- ㊺ 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1期。
- ㊻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12月。